

周其仁 著

改革的 邏輯

修訂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自 序 / 5

第一部分

中國做對了甚麼？

改革 30 年感言 / 003

鄧小平做對了甚麼？ / 007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 / 027

過去十年是改革開放收穫的十年 / 035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 049

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 / 057

公司理論與中國改革 / 081

農民、市場與制度創新 / 095

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

農村改革：國家與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化 / 125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 189

城市化、土地制度與宏觀調控 / 209

試辦「土地交易所」的構想 / 225

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 / 230

成都試驗的新進展 / 240

第四部分

貨幣制度重於貨幣政策

貨幣、制度成本與中國經濟增長 / 251

「貨幣深化」與改革的風風雨雨 / 267

貨幣無僥倖 / 271

銀根與「土根」的糾結 / 276

政府主導投資的經濟性質 / 280

貨幣制度重於貨幣政策 / 285

第五部分

改革驅動的經濟增長

向內轉型的困難 / 295

不能僅靠政府拉動經濟 / 298

經濟增長與企業成長 / 301
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 / 307
三種私人資本和中國經濟 / 316
科斯定理與國資轉讓 / 325

第六部分

中國還需要做對甚麼？

改革是對未來最重要的投資 / 331
民貧國衰、民富國強 / 336
體制政策要靠前 / 341
防止改革成為半拉子工程 / 344
避免糟糕的政策組合 / 347
以規則的確定應對結果的不確定 / 356
「中國製造」的轉型前景 / 362
中國還需要做對甚麼？ / 366
接著石頭過河 / 374

跋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 汪丁丁 / 380

自序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出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了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別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合的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甚麼改革開放 30 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甚麼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麼難？這裡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制從 1952 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 1978 年，總共也不過就是 26 年。其實在 1958 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面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戶籍控制，也沒有從這個產業到那個產業，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制，應該是在 1958 年到 1978 年期間形成的。總計 20 年時間，搞成了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制。可是要怎麼改這套體制呢？從 1978 年算起，到 2013 年已經 35 年了，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麼一個現象裡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為甚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制，改起來特別難？

現在有一個認識是，維繫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歷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制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繫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甚麼顯得特別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制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制。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市場裡是出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於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係、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里。但是一旦把這麼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彙，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彙」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固，特別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了，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彙」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了制度底線，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才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彙」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甚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出錯，否則為甚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這裡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了行不行？乾脆宣佈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新聞，劉鐵男案、劉志軍案、東北四天裡的三場大火，還

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麼大個國家，總有負面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裡，帶有令人不安的體制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一個國家糧庫，一次過火面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向著「天下糧倉」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甚麼就是甚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制被嚴重干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繫。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的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出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釐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土地制度方面需要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只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場大火，工人在車間裡幹活兒，但門卻被反鎖了，著火後人跑不出來，活活被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合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出「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了怎麼辦，用甚麼機制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家制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係，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了。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7天之後，延安城管局局長才現身道歉。他到底忙甚麼去了？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官制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產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係，能有今天的新中國嗎？

聯繫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甚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甚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

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繫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瀰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裡，而在法外的世界裡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章，定得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裡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你前後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幹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甚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伙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可走進生活，哪種利率模式

現實裡沒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裡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裡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面。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制，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第一部分

中國做對了甚麼？

改革 30 年感言^①

改革 30 年的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讓我們覺得有很多話可以說。以農村改革為例，當年我們都在鄉下生活過，恢復高考後上的大學，聽說農村有了變化，不那麼相信。因為多少年農村就沒有大變化，貧困就像自然現象一樣。後來杜老（杜潤生）給了點條件，我們利用暑期到安徽農村調查，看到了改革引起的變化，更知道改革來得多麼不容易。從此就捲入了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最重要的感受，是認識到無論有多大的問題和困難，基層總有一些解決的辦法，總有一些自發的對付困難的努力。這點不會改變，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困難，總有人吃了苦頭，或者讓人不滿意，所以總有人試圖去應對，嘗試解決一下。真正有挑戰性的，是這些分散的、自發的、零碎的努力，在甚麼條件下可以匯聚起來，集中成為政策和制度。

30 年前的農村有甚麼問題？就是農民太窮、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那是離譜的貧困與短缺的並存。不是社會不需要農產品，相反是急迫地需要，可就是沒有供給，同時農民太窮，把整個國民經濟都拖住了。這樣老大難的問題能解決嗎？

你如果是在鄉下待過，就知道同樣的天氣和技術，農民也能把那塊小自留地種好。為甚麼呢？就是體制上有差別：自留地也還是集

^① 本文發表於 2008 年 7 月。

體所有的土地，但歸農戶管理，責任歸農戶，收成也歸農戶。就這點小小的不同，結果農民的行為就完全不一樣。那麼，能不能把自留地的面積擴大一點呢？其實，這就是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包產到戶的由來，無非就是把生產隊的土地劃到每一家農戶，承包給農戶經營。包產到戶早在 1956 年的浙江永嘉縣就有了，問題是 1959—1961 年大饑荒之後，自留地得到了合法承認，但包產到戶還是得不到。

所以我們要曉得，不管中國經濟遇到甚麼困難，要解決甚麼問題，首先自發應對的並不是經濟學家，是身在其中的實踐者。就像當年，農民窮難道農民不知道？農產品短缺難道城裡消費者不知道？都知道。也總有人自發地試圖解決這些困難和問題。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檻，就是自發的民間努力能不能得到國家政策的合法承認。這非常關鍵，1956 年支持包產到戶的那位永嘉縣委書記，倒是給農民提供了政策承認，但他本人卻因此「犯了錯誤」，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回鄉當農民一直當到 1979 年。這說明，不是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早就有，歷史上有，現實中也不斷地冒出來，困難是合法承認的門檻太高。

甚麼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並不需要甚麼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辦法「指導」老百姓如何解決問題。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發的行為裡就有足夠多的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對中國農村改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這一點。農民窮、農產品短缺的問題早就知道，能解決的辦法也早就有了，但過去就是多年不承認，有時不但不承認，還要鬥、鬥、鬥，非把適合生產力的辦法當資本主義去批，口號越喊調門越高，可是路卻越走越窄。

直到改革開放，思想路線端正了，決策人和決策機關眼睛向下，實行一種當年萬里副總理講的「事後承認主義」，先各地試驗、地方承認，逐步被吸收為中央政策，最後立法承認。

難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制度要發生變化，非要等到原體制的維護成本非常高，高到幾乎轉不動了，才有可能改。這樣高昂的體制運轉成本，還要廣為人知，才能內生出變革的意識和實踐衝動。決心面對現實的政治家，願意用自己的政治權威，為自發的改革實踐提供試驗的保護和合法的承認——這就有「戲」了。從這點看，鄧小平和他那個領導集體，對改革的貢獻在歷史上站得住腳。沒有這個條件，底層自發的改革常常自生自滅，不能匯聚成制度變革的偉大力量。

現在人們一般承認 20 世紀 80 年代那五個中央「1 號文件」的歷史地位。回頭看那些政策文件，其實並不是用來教育農民的。農民早就知道包產到戶管用，早就想搞，也多次自發搞了起來。「1 號文件」主要是教育幹部的，說服國家機器的方方面面，用黨中央的權威肯定改革的路數，啟動合法承認改革的程序。這個經驗說明，離開了「官場」的一致認識，僅有底層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是遠遠不夠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研究者、調查者、學者的工作，也幫了一些忙。因為制度變遷之所以發生，除了原體制的運行成本足夠高，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變革老體制的成本要足夠低。降低這方面的成本，最重要的就是降低信息成本。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底層的實踐豐富得很，這裡有這個，那裡有那個，到底實際狀況甚麼樣，有那些可能的選擇，解決問題的辦法又引出了哪些新問題，非有系統而不是零碎的調查研究不可。機緣巧合，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參與了一點降低信息成本的工作，自己從中學到了很多，特別是關於制度變遷的知識。

這樣來看改革，有兩個力量非常重要。一個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難、有需要解決的大問題，總有人想辦法突破。講到底，每個普通人、普通家庭、企業、基層和地方，總有改善生活、發展經濟的願望，因此總有人出頭來面對困難抓住新的機會。這個力量就

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另外一個力量在上層建築裡，就是國家機器的方方面面，對底層的、地方的自發改進和改革的做法，給予合法承認、保護、完善、提升，使之成為政策、成為正規的制度。

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把上述兩種力量連接到了一起，打通了經脈，使中國經濟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和將來，中國的經濟還會有問題，還會有困難，比如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是前幾年沒有碰到過的。怎麼應對新挑戰，事先並沒有完全確定的答案。這樣，我們就有必要從改革30年的經驗裡汲取力量，在底層的自發努力與國家的權威運用之間形成制度變遷的合力，使分散的利益結合成為建設中國經濟的偉大力量。

鄧小平做對了甚麼？^①

本來我為會議準備的是另一篇論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來信轉述了以下意見：「他認為如果沒有一篇關於鄧小平的論文，這次研討會將是不完美的。」來信還說：「你可能是提供這樣一篇論文最合適的人選。」這當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榮耀。不過，我倒願意說明，為甚麼自己願意冒著不自量力的風險，也要嘗試著完成當時已經97歲高齡的科斯——這次研討會的發起人和主持人——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務。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姓名，是在一本小書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給了我兩本小書。翻開一看，是張五常著的《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的前途》，由香港信報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這兩本，卻顯然是盜版的：開本很小，紙質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顯痕跡；封皮上沒有字，裡面印有「內部讀物」的字樣。

在《中國的前途》的第148頁，張五常這樣介紹：「科斯對經濟制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濟前途深表關懷。」書中提到了科斯的兩篇大作，用產權(property rights)與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闡釋了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理論。那時我自己對市場交易沒有多少感受，因此對「交易費用」不甚了了，特別是對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難。但

① 本文為作者在2008年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上的發言。

是，對於「產權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卻立刻覺得它有非凡的解釋力。

為甚麼獨對產權界定別有感悟？容我交代一點背景。我是 1978 年從黑龍江農村考到北京讀大學的。此前，我沒有機會上高中，不過是 1966 年的一個初中畢業生，經歷了 3 年停課，「文革」後於 1968 年上山下鄉。等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已在鄰近蘇聯的邊陲之地上山下鄉 10 年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鄧小平時代的第一頁，就是他於 1977 年 8 月做出的恢復高考的決定。這一頁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命運。

1978 年 10 月後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旋渦中心。我們為重新獲得讀書機會而奮發學習。不過在那時的北京城，似乎也擺不下一張完全平靜的書桌。我們到西單看過大字報，傳閱過當時一切可得的有關日本、美國、歐洲各國、韓國、新加坡和香港現代化情況的報道，也聚在一起收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以及鄧小平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著名談話。站在那個中國開放時代的端口，為了消化大量撲面而來的新鮮信息，我們在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裡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

不過，最打動我們的，還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的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場調查的人帶回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饑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了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產，但「包產到戶」卻不合法，農民只在底下秘密推進行。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我們的困惑是：為甚麼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產、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產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築」的合法承認呢？

1980 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發成立了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志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由於全部

有過上山下鄉的親身經歷，其中還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願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觀察、詢問、調查、分析、研究和辯論，提升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水平。機緣巧合，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潤生先生等前輩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家的欣賞、指點和支持，把我們帶入改革政策的制定過程。其中個人最離奇的經歷，就是身為一個非黨人士，也參加了 80 年代中共中央關於農村改革幾個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成文的全過程——按規矩，這些黨內文件一旦下發，是不可以讓我這樣的黨外人士閱讀的！彷彿在不經意之間，我們見證了歷史：對於 8 億中國農民來說，包產到戶才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偉大活劇的第一幕。

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

包產到戶並不是新生事物。調查表明，早在 1956 年下半年，浙江永嘉縣就出現了包產到戶——剛被捲入高級社的農民發現「大鍋飯」帶來出工不出力的消極傾向，就把集體土地劃分到農戶，以此約束集體成員努力勞動。後來我結識了當年主政那個地方的縣委書記李雲河，他因贊成包產到戶而被革職、遣返老家務農長達 21 年之久！1959—1961 年，包產到戶出現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 40% 的生產隊，農民把能夠有效抵抗饑荒的責任田稱為「救命田」。問題來了：既然包產到戶不是鄧小平主政中國以後才出現的現象，更不是鄧小平自上而下發明或推行的一種土地制度，為甚麼要把農村包產到戶改革看成鄧小平偉大戲劇的第一幕？

答案要從包產到戶本身尋找。「包產到戶」的學名是「家庭承包責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這套制度

下，集體的土地分給農戶，以農戶承擔一定的責任為前提。在開始的時候，農戶的責任通常聯繫著產量——以相應土地面積的常年平均產量為基線，農戶承諾將交多少給國家、多少給集體，以此交換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很顯然，這是一個「增加的產量歸農民」的合約，對生產積極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戶的土地，並沒有改變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它們還是公有的，只不過按照約定的條件交給農戶使用而已。

農民和基層生產隊發明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也證明了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產量、抵禦饑荒。但是，農民和基層生產隊並不能決定包產到戶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認。這是蘇式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派生物：任何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的變動，都被看成事關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須由最高權力當局決定。在中國，從「三條驢腿的合作社」到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組成的超級人民公社，從要不要辦集體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員私養集體的母豬，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奪。可是，毛主席對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饑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產到戶，但只要「權宜之計」產生了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產到戶屢起屢批。

自發的合約得不到法律承認和保護，對當事人的預期和行為就有不利的影響。我們看到，自發的包產到戶固然可以讓農民嘗到增產和溫飽的甜頭，但此種好處究竟能不能持續？未來繼續承包的條件有甚麼改變？以及在甚麼情況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這些疑慮都影響著農戶的生產和投資（農地保護和改良）決策。這是來自合約本身性質的一個實質性的困難：作為有待兌現的一組承諾，不穩定的預期無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約的履行成本。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家政策的方向，轉向了對促進生產力的

自發合約提供合法承認與保護。這並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家一時心血來潮的傑作。據杜潤生回憶，早在 1962 年鄧小平就談道：「生產關係究竟以甚麼形式為最好，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杜潤生回憶錄》，第 332 頁）這說明，鄧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認」對特定生產關係（產權與合約）的意義。當歷史把他推上了核心領導地位之後，鄧小平就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農民和基層創造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在鄧小平路線下，農民家庭承包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後邊遠地區擴展到發達地區農村，進而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的農村生產隊；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擴展為「長期不變」；合約的責任從聯繫產量開始，逐步演變為聯繫土地資產。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不斷得到更高規格的合法承認：從基層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後，2002 年，中國人大通過了《農地承包法》，確立了農戶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這部法律，全部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都長期承包給了農戶；「集體」仍是農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經濟職能就是到期把所有農地發包給農民。隨著承包戶擁有續訂合約的優先權，「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

中國人創造的這個經驗，讓我們想起了科斯在 1959 年提出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譯本見《生產的制度結構》，第 73 頁）我們可以說，產權界定也是合約的前提——要不是雙方或多方各自擁有清楚的資源產權，他們之間怎麼可能達成任何一個合約？可是，中國的實踐卻提醒人們：恰恰是承包合約才界定出清楚的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因為在訂立承包合約之前，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戶究竟對集體土地擁有何種權利，通常是模糊不清

的。這是不是說，農戶的產權反而是經由合約才得到界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可以得出一個新的結論：合約締結與產權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開的同一回事。

合約可以經由再合約（re-contracted）得到調整，而經由合約不斷界定的產權也就可以不斷進一步明確其經濟含義，並逐步提升產權的「強度」。我們在中國看得清楚，後來被列入《憲法》保護範圍的私人財產權利，最初就是從城鄉公有經濟的承包合約中產生並發展起來的。私人承包獲得的公有資源在約定條件下排他的專用權，不是私產又是甚麼？按照承包合約，超出約定產量的部分一般歸承包人所有，這難道不正在創造更完備的私產嗎？隨著承包私產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產不斷由少增多、由弱變強，公有制成員不斷擴大對外締結合約的範圍，循序漸進地積累起更多的私產，也進入更豐富多樣的市場合約網絡。這套經由合約界定出清晰產權的辦法，從農業擴展到非農業，進而擴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

來芝加哥參加這次會議的時候，正是中國春小麥的收割季節。此刻在華北農村的田野上，有一幅壯觀的畫面：成千上萬台拖拉機和收割機，順著莊稼成熟的路線跨村莊、跨市縣、跨省份移動。這些拖拉機和收割設備，有私人的，有多個私人擁有並集合到一個合作社或一個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給私人經營的。他們作業的範圍，早就超越了一個個「集體」的狹小範圍，唯有一個複雜的市場合約網，才把他們與數目更加巨大的農戶、合作社、公司制農場的收割服務需求連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參加了進來，一道道緊急頒佈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對這些農機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務。這是經歷了 30 年改革的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產權與合約構成了所有活躍的生產活動的制度基礎。

鄧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過「產權界定」的理論表達。可是，鄧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堅持產權界定並寸步不移。這套中國特色的產

權界定，一直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批評。一種批評說，鄧小平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經濟的最後邊界，因而背離了經典社會主義。這個批評忽略了繼續維繫一個不斷支付昂貴組織成本的體制的巨大代價，這一點，人們通過比較改革的中國與拒不改革的那些國家在經濟表現上的顯著差別，就可以獲得深刻印象。另一種批評認為，基於承包合約的產權改革遠不如「全盤私有化」來得徹底和過癮。這種批評則看輕了制度變遷所要付出的代價：只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了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在實際上都寸步難行。甚至，制度選擇的「最終目標」也受制於交易費用的狀況。例如，這次我們大家到芝加哥大學開會，都要藉助屬於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為甚麼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徹底化為「私路」呢？答案是費用。每人一條專用的道路顯然太過昂貴，於是社會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時約束人們的行路規範。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一點，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任何產權、組織或合約形式，只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鄧小平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家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合法承認。這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策略。但是，有了自科斯以來的經濟學的進展，我發現在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裡，包含著具有很高普適性的道理，這就是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制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把企業家請回中國

2006年，我訪問了浙江東部台州市松門鎮的一家民營公司。創辦人叫江桂蘭，是個農家女，中學畢業後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貸來的20萬元，辦起了這家塑料製品廠。4年後，江桂蘭在廣

交會上向別人轉租來的六分之一展台上，與外商簽訂了第一個出口合同。又過了 10 年，江桂蘭的公司已成為肯德基全球範圍所用餐具的主要供貨商。等我到訪的時候，江桂蘭的公司有 1,000 多名工人，每年出口 600 個集裝箱製成品。

江桂蘭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平常。比起華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馬雲、吉利汽車的李書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營公司老總，江桂蘭過於普通了。不過，要是在改革前，江桂蘭的公司就是不到現在的百分之一也容易「舉世知名」——在那個時代，任何「自由雇用」工人的企業，都有機會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聞的榜首！同樣是私人辦公司，從被看作「資本主義」的洪水猛獸，到被戴上「民營企業家創業」的桂冠，滿打滿算也只不過 30 年——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人們當然要提到來自實際經濟生活的壓力。一方面，在「短缺經濟」下商品和服務的長期匱乏，滿足不了城鄉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單一公有制經濟又容納不了日益增長的就業要求，特別是不能吸納包產到戶改革後釋放出來的巨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兩方面壓力的匯集，逼迫中國以更靈活的方式組織經濟。

於是，在單一的公有制經濟下，出現了野草般頑強成長的「個體戶」。當年北京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鄉知青在路旁擺攤出售「大碗茶」。他們自我僱傭或利用家人勞動力，靠私下籌集的小資本捕捉種種市場機會。一些個體戶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擴展的市場要求他們進一步擴大生意的規模。結果，「個體戶」開始越出了「家庭勞動力加兩三個幫手」的規模，向著雇用更多工人的「私人企業」方向演變。挑戰來了：社會主義中國怎麼可以容許「資本主義剝削」的復辟？

對傳統思維而言，私人擁有生產資料，自由雇用、特別是雇用

工人超過 7 人以上的企業，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剝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這條馬克思和前蘇聯模式劃下的鐵的界線，中國自 1956 年完成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就再也沒有逾越過。現在，改革突破了傳統戒條，是不是「走資本主義」的疑慮籠罩中國。

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面旗幟的鄧小平，抓住了一顆瓜子破解難題。80 年代初，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炒賣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場追捧，生意迅速擴張。1981 年 9 月，年氏父子三人從雇 4 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展成一個年營業額 720 萬元、雇工 140 人的私人企業。「傻子」當上了老闆，爭議也從蕪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奪小小一顆瓜子裡面的大是大非？

我當時供職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是杜潤生領導的，他組織了關於「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並把有關材料報到了鄧小平的案頭。記得當時傳回來的鄧小平指示，斬釘截鐵就是「不要動他」四個大字！其中，最了得的還是那個「動」字，因為這一個字就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既然歷史經驗顯示過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鄧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試試，再也不准用專政手段對待像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家。

鄧小平的辦法就是允許實踐，並從實際出發來觀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並不難釐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廣久雇用的 140 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國有公司的工作機會；年廣久付給工人的薪水，不低於當地國有工廠的給付水平；這些工人原本或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但收益還不如給年廣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場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給——老闆與老闆的市場競爭加劇了，不但是顧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公案又作何處理？

沒有人指出，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是交易費用為零。馬克思在理論上堅持，當資本在「流通領域」雇用勞動力時，雙方交易遵循的

是等價原則。在這裡，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商品的價格等於價值，因此就排除了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奧秘發生在其後：當資本家帶著雇來的工人進入工廠的大門以後，通過組織、指揮、命令工人生產出高於其勞動力價值的產品；最後，企業主帶著這些產品回到商品流通領域，再次通過等價交換而完成剩餘價值的實現。

很明白，在上述各個環節，都沒有交易費用這回事。不是嗎？資本家似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顧客及其需求的各種細節，從而決定生產甚麼和生產多少；資本家也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待雇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從而決定以甚麼價格、甚麼合約形式雇多少要素；資本家甚至無須付出監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團隊產品自動大於團隊成員個人產品的算術之和。在這個前提下——也僅僅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當然同意馬克思的意見：「剩餘價值」不但是「多餘」的，而且還帶有道義上不公正的剝削性質。

問題是，真實世界裡的交易費用絕不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務的買家與賣家，特殊如資本家與工人，他們之間在市場上的互相發現、訂約和履約，都要付出昂貴的費用。交易費用不為零，就既不存在自動的「等價交換」，也不存在不需要經營、監督和管理的經濟組織。從這點看，發現市場、協調供求、組織生產等項職能，絕不是「多餘的」。資本家們獲取的報酬，部分是投資於企業的財務資本的利息，部分是作為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服務回報。至於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場競爭——企業家與企業家的競爭、工人與工人的競爭、商品買家與買家的競爭以及商品賣家的競爭——決定的。

資本家當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對稀缺性謀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場中人一樣，資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約的過程中，侵犯、損害各相關利益方——其他股東、各種債權人、工人、上下游供應商、產品經銷商，甚至顧客——的利益。人們可以用「剝削」之名囊括所有這些侵權行為，但是無論如何，「剝削」並不是資本家的唯一職

能，正如可能的假冒偽劣行徑並不是商販的全部職能一樣。在真實世界裡，人們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與增加交易費用的行為——兩者皆可圖利——經常混雜在一起。究竟哪一種行為主導了經濟，取決於現實的約束條件——習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實際執行。

那麼，究竟怎樣對待真實過程裡的資本家呢？蘇聯模式得出了一個革命的結論——「消滅資本家，消滅一切剝削」。但是，這樣一來，把資本家節約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職能也一併消滅掉了。問題是，交易費用並沒有隨著資本家的被消滅而消失。社會主義經濟仍然面臨節約建設成本、生產成本、制度成本和組織成本的嚴重問題。結果，把資本家打翻在地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好由自己來扮演「總資本家」的角色，即用「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法權」（列寧）來管理國民經濟。幾十年的實踐結果表明，中央計劃體制不但運行成本奇高，也並沒有完全消滅「剝削」——作為等級制替代產權與市場合約制度的產物，官僚特權替代了資本家的剝削；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多勞不能多得的人，天天受到「不多勞卻多得」行為的剝削。這個結果應該出乎革命家當初的預料，它當然要被反思。鄧小平不允許把重新冒頭的民營企業一棍子打下去，堅持多試試、多看看，意在探索把複雜問題分開來處理的路徑。蘇聯和中國自己的歷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中國改革的決策者，為甚麼社會主義經濟非要把資本家連同創業精神、市場判斷力、組織和協調生產的能力一起拋棄呢？

鄧小平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他執掌中國後不久，就高度肯定了歷史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榮毅仁，並大膽決策劃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家」的新經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表態，不准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家的存在，難道真的

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

越來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確答案。隨著企業家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業當企業家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 (the right)。改革以來，中國發佈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並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並保護了普通人自由締約、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權利。據一項權威發佈，到 2007 年底，中國的民營經濟約佔國民生產總值 50%、非農就業的 70%、稅收的 30%—40%。這是改革前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像的。

重新認識「看不見的手」

從 1985 年 5 月開始，鄧小平連續幾年推動「價格闖關」。這意味著，原來由國家規定和控制的物價，要放開由市場決定。此前，中國已形成了一種「價格雙軌制」，即按計劃指令生產的產品由國家定價，超計劃增產的產品則按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這個過渡性的體制，在顯著刺激增產的同時，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亂：同一個產品的「市場價」高於其「計劃價」數倍甚至十數倍，以至於任何有「門路」的人，都有機會把計劃軌道上的產品倒賣到市場上而大發橫財。一時間，「尋租」盛行，公眾反感。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決心推進價格改革，解決問題。

價格改革之所以被稱為「闖關」，是因為此前的波蘭，因放開食品價格，影響工人生活，導致了大罷工和波蘭共產黨的下台。中國「價格改革」的代價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穩推進，沒有誰可以打包票。鄧小平決心用自己的權威推進價格闖關。他甚至說，趁我們老同志還在，勇敢闖過這一關。

1988 年 7 月，國務院宣佈開放名煙名酒價格。這其實是一次試探性的前哨戰。8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價格、

工資改革的方案》。不料，會議公報發表的當天，全國各地就出現居民搶購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擁到銀行擠提存款的風潮。10天以後，國務院宣佈加強物價管理，不再出台物價調整項目，提升銀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頓市場秩序。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開展全國範圍的「治理整頓」。第一波「價格闖關」擱淺。

事後我的理解是，在累計發放貨幣過多的條件下「放開價格」，勢必把原來的「隱性通脹」轉化成群眾不可能接受的顯性高通脹。這證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強力支持，在高通脹環境下也難以順利推進價格改革。中國進入了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頓」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銀根、壓投資、管物價；經濟增長減速，經濟改革停滯。讓中國和世界大吃一驚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奮力推進中國改革。他以一個88歲退休老人的身份，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特別提出了長期困擾中國改革的問題：堅持計劃體制是不是就等於姓「社（會主義）」？走市場之路是不是就等於姓「資（本主義）」？他的答案石破天驚：計劃和市場都不過是配置資源的方式，社會主義同樣可以走市場之路。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國於1992年再度勇闖價格關。是年，新放開的生產資料和交通運輸價格達648種，農產品價格50種，其中包括在全國844個縣（市）的範圍內，放開了長達幾十年由國家統購的糧食價格，並放開了除鹽和藥品以外全部輕工業產品的價格。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闖關」最終成行，「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

經濟學家通常會不遺餘力地推崇市場價格機制。這不足為奇，因為有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傳統的鼎力支持。可是，為甚麼鄧小

平也對「看不見的手」情有獨鍾？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野戰大軍、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擁有一雙「看得見的手」！他難道不知道，擴大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範圍，總要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看得見的手」發號施令的範圍？大權在手，又堅決推進價格闖關，這究竟是為甚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涉及三個層面。第一，蘇聯式計劃體制的實質，是把整個國民經濟辦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這個超級國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組織運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產全部信息的成本、決策和指揮的成本，以及發現錯誤並加以糾正的成本等等。作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一員，鄧小平多年負責處理國家一線事務，幾乎就是這個超級國家公司的執行長。正因為對原有體制不堪重負的成本壓力有切身感受，也對原體制的運行效率極不滿意，才迫使鄧小平比局外批評家更明白，權力過於集中的主要結果，恰恰是無法有效行使國家權力。歷史把這位執行長推上了決策人的位置，鄧小平決意改革，順理成章。

第二，鄧小平倡導的開放，啟迪了一代中國人，也啟迪了他本人。作為 1978—1982 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學生，我感受到那幾年湧動的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想法、新衝動，無一例外都來自多年封閉後對外部世界的觀察、比較和思考。無論歐美日本、亞洲四小龍，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所有當時在經濟成就方面令中國羨慕的經濟體，沒有一個套用蘇聯計劃模式的。這些經濟體都允許「看不見的手」發揮基礎的資源配置作用。他們的經驗說明，價格機制並不是洪水猛獸，中國為甚麼不可以大膽試一試？

最後一個層面最為隱蔽。鄧小平的哲學，是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國家要富強，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所有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產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國式權利界定和把企業家請回

中國的改革政策。新的問題是，當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家庭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之後，如何協調十數億人口爆發出來的競爭致富衝動，就成為新的經濟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傾心於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僅靠國家計劃之手，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開放後如何協調整個中國經濟的新課題。

敘述至此，我們也許要為一件事情而感到遺憾，那就是科斯教授從未訪華，因此也沒有與鄧小平先生謀面的機會。不過，我猜想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科斯在 1937 年創立的公司理論，出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制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出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 1937 年就發現，價格機制並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了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制、靠企業家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firm）就應運而生了。

鄧小平的出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在這裡，國家用「看得見的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了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組織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卻每日每時困擾著這個超級國家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出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家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的合法認定，激發了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還同時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制協調一併請回到中國經濟的舞台。

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看不見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制協調並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並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不

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釐定，摩擦和衝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歷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制可以在一個經濟體裡共存並用，並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線。

腐敗的挑戰

鄧小平關於中國的許多預言都已經實現了，不過，有一點至今還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隨杜潤生先生前往溫州調查的路上，聽到傳來的鄧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國不能出現百萬富翁，不能走兩極分化的道路。到達溫州的時候，當地人也正在熱烈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溫州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身家財產早就超過了百萬，分明已是百萬富翁，怎麼辦？討論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家的私人財產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於自己和家人的消費享受，大部分還是用於生產——如果把消費資料與生產資料恰當地分開來，溫州和中國就「還不能算已經有了百萬富翁」。既然如此，鄧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違背了吧？

僅僅過了10年，個人的消費性財產超過百萬的例子在中國就不勝枚舉。數千萬的世界級名貴跑車在中國熱賣——那可不是「生產資料」。2000年的前後，全球頂級奢侈品的專賣店紛紛在北京、上海、深圳開張，市場說這裡是成長最快的奢侈品市場。由於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力量，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進入了百萬富翁的行列。所有這些，可以不無理由地被看成經濟成就的象徵。但與此同時，官方統計和報道、國內外學界的調查以及對社會生活的直接觀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國還有不少生計艱難、平均每天收入不過1美元的貧困人口。

學者們用基尼係數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狀況，發現改革後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趨向。這類測度可能忽略了一點，即「收入的獲取是否合乎公義」並不是定量技術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貪官們賣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眾輿論真正痛恨的是後者，因為其收入不合公義。可是，關於收入差距的測算並不能劃分這個極其重要的區別。其實，真正威脅改革存亡的嚴重問題是，即使根據反貪部門公開發佈的腐敗案例，人們也看到利用公權力腐敗——顯然不合正義的收入——的趨勢在中國有增無減。

除了當事人的道德水準外，貪污腐敗的趨勢到底與甚麼有關？對此，張五常曾提出過一個理論。在本文開首提及的《中國的前途》裡，五常指出，就競爭稀缺資源而言，人類社會形成了兩種基本的經濟制度。一種以等級制特權來規範和約束人們的行為、防止稀缺資源被徹底濫用。另一種就是產權制度，即以財產權利的界分來劃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以刺激生產、交換、分工與合作。張五常更推測，當第一種經濟制度轉向第二種制度即市場經濟的時候，腐敗將大量發生，因為原來的等級特權無可避免地要爭取最高的「權力租金」。這個過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敗」(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後來的中國經驗的確表明，腐敗不僅僅是改革啟動的一種伴隨物，也是瓦解公眾支持改革的腐蝕劑，甚至是終極改革的致命殺手。轉型經濟怎樣應對制度化腐敗，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鄧小平的答案是多手並舉：道德教育、黨的紀律和法治。我不認為還可以想出更多的辦法來遏制腐敗。問題是，在上述分權改革、重新界定權利、承認並鼓勵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利用價格機制的每一個過程中，腐敗不但形影相隨，且有更快蔓延之勢——腐敗跑得似乎比改革還要快！1986年9月，鄧小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

濟改革體制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76—180 頁）。為此，他開始部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遠為複雜和困難。最主要的癥結是，經濟改革觸犯的經濟既得利益，還可以用經濟手段補償，但政治改革觸犯的既得利益，拿甚麼來做補償？舉一個例子，原來「享受低價好處」的居民家庭，一旦價格放開後受到損害，政府可發財政補貼給予補償。但是，原來主管物價的政府部門，價格放開後就面臨權力縮減、部門撤併，甚至官員下崗的現實威脅。對於一輩子管物價的官員來說，他身上的專用人力資本一夜之間全報廢，他能接受嗎？用經濟辦法來補償「喪失權力的損失」嗎？出價低，不可能被接受；出價高，國家財政不堪負擔——等級制其實是非常昂貴的。聽任掌權者自己補償（貪污腐敗是也）？公眾不可能接受，而那樣「補償」的結果，一定是更捨不得放棄權力。那麼，可以不予補償就取消權力嗎？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於革命。

鄧小平多次講過「改革也是革命」，不過他面臨另一項約束。作為「權力過於集中」的派生物，中國的黨政骨幹系統發達，但其他社會軟組織發育不足，行政系統實際上負擔著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轉。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體制改革副產品——重新安排官員——的難度。另一個連帶的後果，就是國家權力體系一旦失穩，整個社會就容易動盪。所以，推進「也是革命」的政治體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穩定」為邊界。於是人們看到，1986 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實質推進。一年以後的中共十三大，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綱領，但沒等到切實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後發生的風波，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即使 1992 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也限於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並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竟的事業。

小結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為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無可更改的背書。如果用大多數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準，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一定會被寫入歷史。當然，偉大成就的成因是複合的，人們對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觀點是，正是改革開放大幅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才使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有觀察家以為，「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競爭力的根本。對此我的問題是，改革前中國勞動力和其他要素的價格更為低廉，為甚麼那時候並沒有影響全球市場的「中國製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識擴展才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基礎。不過若問，為甚麼中國人，特別是年青一代的中國人對知識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轉變？答案是，改革激發了中國人掌握知識的誘因，而開放則降低了中國人的學習成本。綜合起來，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制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國經驗的真正秘密。

鄧小平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也開啟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不過，他並沒有完成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在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範方面，中國都有大量未完成的議題。作為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後面，並面臨改變著的社會思想條件。就在科斯先生主辦的本次研討會舉行期間，全球金融動盪和油價高企，正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前所未有的新考驗。受匯率、利率、資源價格和行政壟斷部門等重大改革滯後的拖累，中國

經濟能不能順利應對這場新的挑戰，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未定之數。

2006年在深圳，我有幸聽到張五常的如下見解：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觀察，不容許我像他那樣樂觀和肯定。不過，30年來中國的經驗的確證明，未來絕不是宿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歷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於中國的樂觀斷言。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①

科斯不懂中文，也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他還像蘇格蘭的偉大學者休謨 (David Hume) 一樣，天生具有「人貴述己而不自詡」的格調，既不容他人吹捧，更不會自吹自擂。正因為這樣，「科斯的中國影響力」就成為一個在慶賀科斯教授百歲生日時，值得我們大家討論的問題。

我認為，科斯的影響力，首先來自科斯經濟學 (Coasean Economics) 的內容。我們都知道，科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將交易費用引入了經濟學分析。誠如他本人所言，這固然算不上經濟學高深理論方面的「創新」，卻「引起經濟學理論，至少是價格理論或微觀經濟學結構的徹底變革」。是的，自從科斯在他 27 歲發表的論文裡引進了「幾乎可以歸入不證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費用概念以來，已經沒有一門經濟學可以完全不理會交易費用卻還能夠闡釋經濟行為的邏輯。

毫無疑問，科斯的上述貢獻有著普遍意義。在科學上，從完全意識不到交易費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費用為零，再到進入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認識層面。對此，我們不妨以其他科學為參照來加以理解。例如，沒有人會否認在摩擦力為零的假設下，物理學研究取得的重大進展。正

① 本文為值科斯 2010 年百歲生日之際，作者在「科斯與中國」研討會上所做的演講。

是站在這個台階上，物理學家才可能進一步展開對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這裡的關鍵是，要假設摩擦力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類似地，經濟學倘若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楚的意識和概念，就不具備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規則、合約及其履行、組織、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講演的題目所統稱的「生產的制度結構」——成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學分析，也就要求正統經濟學理論分析制度的建立與運行，發現作為限制條件的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一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之後逐漸被收窄的視野——核心部分甚至是僅僅關注價格決定的價格理論——就得以重新擴展，成為包括分析產業、市場、企業和其他組織、政府與國家，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約束下所有人類行為的經濟學。這樣的經濟學，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科斯經濟學首先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影響力。這或許是因為，他提出交易費用概念的論文研究的是企業的性質，經驗基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裡的公司；他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並以此為台階走向正交易費用的世界，經驗基礎則是西方國家法治下侵權判案的司法實踐。無論市場裡的公司，還是侵權判案的司法傳統，對西方讀者來說都是不難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經濟學思維的束縛，換一個視角——科斯的視角——看世界，這個真實世界就在那裡了。

當科斯的字樣剛剛為中國人所知的時候，中國的實際世界裡既沒有發達的公司，也缺乏法治傳統。就是說，在我們這裡尚沒有深入理解科斯經濟學的經驗基礎。所以毫不奇怪，科斯開始是作為西

方經濟學流行的一個學派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國影響力，後來人們甚至可以說，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比他在歐美的影響力還要廣泛、深刻和持久。這又是為甚麼？

我的理解是，科斯經濟學包含著另外一個方向上的重要內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注意，卻引起中國經濟學家和讀者的高度興趣。讓我們回到科斯論述企業性質的那篇著名論文來理解這一點。在文中，科斯問：在價格機制協調配置資源的市場裡，為甚麼存在靠權威下達的命令組織運行的企業？科斯的答案今天眾所周知：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並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

科斯的分析沒有到此為止。他接著問：既然企業可以節約市場的運行成本，那麼是不是企業越大，節約的交易費用越多，經濟就越有效率呢？這個問題有更普遍的意義，如果哪一種經濟廢止了所有市場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費用，其經濟運行是不是就達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對此的回答是，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同樣也要受到經濟力量的制約。這是因為，市場運行不免費，價格機制不免費，企業連同企業家下達命令、行使權威的協調方式，也不免費。用企業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無可避免地要支付另一種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組織成本」。

很明顯，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個方向的實際活動都受到成本約束的基礎上。難道不是嗎？市場受交易費用的約束，可以通過企業來節約交易費用；而企業又受到自己組織成本的約束，限制了其所能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的大小和範圍。正是通過對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不斷權衡，科斯才確立了企業在市場裡的理論邊界。

彷彿在不經意之間，科斯就劃清了他的企業理論與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界限。簡單地說，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也是一種企業理

論：隨著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企業內的計劃、權威和命令就擴大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權威與命令。由於不受企業組織成本的制約，覆蓋全局的權威、計劃和命令再也無須為市場交易留下任何空間，交易被消滅了，交易費用自然也就消失了。這樣看，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確與「西方經濟學」冰火不容：前者完全意識不到計劃、權威和命令的成本，後者則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靜地告訴我們，那對立的理論兩極共同的思維方法，是無視真實的成本限制。

中國開始知道科斯的時候，中國面對的經濟難題不是市場的交易費用太高，而是籠罩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央計劃命令體制的組織成本太高。因此，中國改革的出發點，是如何解決國民經濟的決策權力過於集中，計劃命令的信息成本過於高昂，以及個人、家庭、單位和地方的工作積極性過低的問題。對於這一點，我在提交給紀念中國改革 30 年的芝加哥大學討論會的論文裡，有過以下回顧：

科斯在 1937 年創立的公司理論，出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制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出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 1937 年就發現，價格機制並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了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制、靠企業家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就應運而生了。

鄧小平的出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在這裡，國家用「看得見的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了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組織成本」，卻每日每時困擾著這個超級國家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出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家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

的合法認定，激發了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同時還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制協調一併請回到中國經濟的舞台上。

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看不見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制協調並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並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不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釐定，摩擦和衝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歷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制可以在一個經濟體裡共存並用，並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限。

據此，我在那篇發言裡還大膽地推斷，如果科斯教授有機會與鄧小平先生謀面，「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

其實，唯有在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端，「交易費用為零」才不再是一個理論假設，而是接近於真實的現實。這是因為，當市場交易被消滅時，再也無所謂交易費用。經濟每日每時付出的是另外一種成本，即全盤計劃的指令出錯、資源遭遇錯誤配置的超級國家公司的「組織成本」。科斯分析的含義是，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接近於零，經濟的組織成本就一定趨於無窮大——這恰恰是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特徵。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劃經濟即超級國家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啟發了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這樣看，最早觸動中國經濟學家的科斯經濟學，重點並不是怎樣通過企業組織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而是怎樣發展市場經濟來節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超級公司那極其高昂的組織成本。中國在實踐中走出來的改革路子，即分權、重新承認並界定產權、發揮價格

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給企業和企業家協調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裡得到最簡潔的解釋：重新在產權、合約、市場的基礎上協調國民經濟，花費的代價當然不菲，不過只要改革的成本低於原先國家超級公司運行的成本，經濟還是會因此而獲得增長。在真實成本的限制下，「用一個合約代替一系列合約」所能帶來的節約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償失，那就不妨試試「用一系列合約代替一個組織」吧。

科斯從來不認為他和他的經濟學可以「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他的道德原則和信奉的方法論也不允許他那樣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次講演中引用了弗蘭克·奈特的話：「科學的基本規則——真實和客觀——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觀的先決條件是正直、能力和謙虛。」他本來是用這段話讚揚沃倫·納特教授的，但是每個直接接觸過科斯的中國經濟學家，都會同意「真實和客觀」，以及支持客觀態度的「正直、能力和謙虛」，這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為人風格。他的助手王寧告訴我們，即使到了百歲高齡，科斯老人還是會認真閱讀比他年輕不知多少、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學家的文字，還會認真傾聽每位來訪者的問題、敘述和見解。就科斯而言，我們相信奈特說得對，科學的基本規則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

在方法論上，科斯堅持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他批評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流行特徵，就是分析的日趨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對真實經濟體系進行詳細了解，「甚至在完全沒有關於真實經濟體系真實情況的前提下，也可以發展理論」。科斯的堅持其實是哪一門經驗科學的堅持，因為不從觀察現象出發，對規律的猜測就不可能有堅實的基礎。科斯對其方法論的堅持也是他的中國影響力日增的一個原因。這是因為，遵循科斯的方法論原則去從事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學人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經驗科學而不是神學的殿

堂。科斯本人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從求學的青年時代開始，就踏實觀察市場裡的企業，認真思考可觀察現象中那些不能被現成理論（當時是價格機制理論）很好解釋的部分，勇敢提出問題，並進而提出自己的理論猜想。無論我們的天分怎樣遠不如科斯，只要遵循這條路線走，我們總會更有機會做出有意義的科學工作。那麼多歐美經濟學家連認真觀察歐美經濟現象的時間都不多，我們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爺正在把觀察中國現象、提出中國問題並做出科學猜想的難得機會，更多地留給了中國的經濟學人？

最後，科斯的鼓勵——中國經濟學家要基於中國經驗研究「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還帶給我們極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過 30 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受任何教條支配的社會科學的試驗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已在分權改革中解體，但國家超級公司的碎片還充斥於市場之中，與私人產權、合約和企業一起參與著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簡潔的概念來看，「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還有著過於多樣的組合，並無一不在繼續發生變動。因此，價格機制的範圍、企業的邊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管制的邊界，既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釐定。在複雜的轉型環境裡，中國經濟的走向當然與中國經濟制度的走向密切相關，問題是我們對後者所知甚少。

也許值得注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實——人們更喜歡稱之為「中國奇跡」——也刺激了理論家們的膽量，以至於任何一種猜測出來的因果聯繫，都可以聲稱找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斷言舉國體制才是中國經濟輝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這種體制繼續擴展。有人肯定彼此競爭的地方政府運用合法強制力配置資源，促成了中國經濟，特別是城市面貌令所有人大吃一驚的變化，因而構成了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有人認為席捲美國和全球的金融危機進一步顯示了市場的缺陷和失敗，人類正進入一個也許可以

由中國領頭的、需要擴張政府調控和管制的新時代。我相信，所有這些觀點都包含著一些真理的成份。不過，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論來考量，我們可能還需要對各個方向上發生的真實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對中國體制的現狀和未來，得出經得起更長遠歷史檢驗的判斷。

為此，我們為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國影響力保持得更為長久。

跋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汪丁丁

我套用了王元化先生反覆引用的馬克思命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裡，最耐人尋味的，就是「上升」二字。今天的年輕人大多習以為常的是「從現實上升到理論」，很少想到怎麼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元化先生早年深研《文心雕龍》，中年因胡風案被難。文王囚羑里而演八卦，元化囚陋室而讀《小邏輯》。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元化讀《小邏輯》三遍，書頁幾散。由此，素來主張以生命融入學問的元化先生，對黑格爾邏輯以及任何邏輯（或原則）能否涵蓋真實世界產生了懷疑和批判。

編輯邀我為其仁此書寫推薦語，我回信告訴編輯，我讀其仁的書，必寫書評。其仁於我，情同兄長，我的書評不能是序，只應是跋。我對其仁的尊重，還有更重要的理由，由這篇跋文的標題揭示。多年來，我雖熟悉或被認為廣博閱讀了各種理論，卻深知理論或任何邏輯自洽的體系之內在缺陷。在許多場合，例如某一年與 CCER（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新生見面，我發言強調的，多是理論之內在缺陷。我以為，金岳霖先生的概括最是精當：理有固然，勢無必至。這裡最難為年輕人的，就是真實世界的「勢」，它雖在某種意義上與「理」相合，卻不是必定要發生的。李零概括中國古代「兵家」的基本原理為「任勢不任人」，與儒家十分不同，所謂「形勢比人強」。

其仁在收入這本書的某一散論中表示過，他對於在想像力的約束下表現高超的理論建構能力毫無興趣，他只關注現實問題。可是，每當我介紹其仁這套見解時，總會有學生們追問我甚麼是「現實問題」。學生有學生所見的現實問題，通常受大眾媒體的引導，也有他們的「常識」。

金岳霖先生關於邏輯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曾發表經典見解，我也常引用：全體現實可能性的集合是全體邏輯可能性的集合的一個子集。近年來，我引用金先生這一見解，是為了說明創造性為何不可能被容納到全體邏輯可能性的集合之內。我的理由是，創造性就其實質而言只在未來呈現為邏輯可能性，而邏輯學所論的任何「集合」只能涵蓋靜止於某一時刻的全體可能性。其仁關注的，就其實質而言，是尚未被普遍意識到的可能性——或就這本書而言，是他在社會調查中感悟到的未來可能得到政治承認的制度創新，不是隨意可見的創新活動，而是可讓他感悟到大勢所趨的「勢」的那種創新活動。換句話說，金岳霖先生討論的「現實可能性」，並不包括未出現或未被意識到的現實可能性。回到金先生所言的「勢」，漢語的字源學顯示，這一單字與「幾微」關係密切。幾，就是「幾何」這一漢譯的來源。將發而未發，謂之「幾」。理科學生，切不可小覷這個「微」字。國學第一經典《尚書》（「禹謨」）已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的能力之一就是「見微知著」，由一葉而知秋。維護社會健康，由表及裡的方法，我們稱為「防微杜漸」。還有一套由裡及表的方法，中醫謂之「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換句話說，西醫差矣，因為它沉淪於「治已病」，忘了「未病之病」才是病之本源（今天西醫承認這是「亞健康」）。那麼，怎樣醫治已病的中國社會呢？仍有兩種思路。西醫的思路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已病而已。中醫的思路是治未病，尋求病之本源。我長期觀察其仁，我認為這也是其仁的思路（參閱這部作品第四部分）。但是，對治未病之病，不論醫家提出怎

樣合「理」的處方，總要面對「勢無必至」的可能。因為，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幾」，將發而未發。為甚麼多年來 CCER 許多學生跟隨其仁作社會調查而難以學會其仁的洞察力？我的解釋是，其仁的社會調查並非通常的社會調查，其仁注意力所在，唯「幾」而已矣！

改革的邏輯，與前不久張維迎一部作品的標題「市場的邏輯」，兩相呼應。維迎在那部作品裡強調了「企業家」於市場經濟的核心重要性，其仁在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乃至第三部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反覆強調的，是諸如鄧小平這樣的「政治企業家」於中國政治經濟演化的核心重要性。凡論及企業家活動，由這類活動的創新本質決定，我們必須將只在未來才被普遍意識到的那些現實可能性納入分析框架，於是，如前述，與「邏輯」之本義有內在衝突。因此，這兩部作品的標題所稱「邏輯」，是口語意義上的類比，並非學術意義上的自治體系。

在想像力的約束下，如每一位數學系本科生的日常功課所見，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建構許多邏輯自治的體系。但是，邏輯學泰斗（也是哲學家、社會理論家和政治活動家）羅素明確表示過，任何邏輯自治的體系裡，總有一個或兩個（或多於兩個）被稱為「邏輯常項」的參量最為重要，因為這些參量是邏輯體系與真實世界的基於常識的界面。當我們關注真實世界時，在想像力約束下存在著的無數邏輯可能的邏輯自治的體系當中，只有為數極少的，與真實世界密切相關。凡參加過經濟學研討會的留學生，常聽到參與者的評論：這是不相關的（this is irrelevant）。很嚴重的批評，你皓首窮經十年寒窗炮製出一套理論，被認為與真實世界「了無關係」，多麼致命的打擊呀。是的，經濟學是介於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社會科學，它必須堅持哪怕僅通過一個邏輯常項與真實世界相關，而不能不相關。

我尊重其仁，私人情感之外，主要理由就是上述我的這套理論見解——哪怕我熟悉千百種理論，我其實最關注的仍是與真實世界

相關的理論。而這一相關性，或者說，我與真實世界保持的基於常識的界面，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是否認真地傾聽其仁的聲音。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方法，馬克思寫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三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裡（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卷 46 上冊「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指出：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甚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麼，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近的規定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馬克思認為，以往的經濟學家採取了上述的第一種方法，也就是從具體進入抽象的方法，非如此而不能建構經濟學的「體系」。而馬克思自己堅信真正的科學方法是上述第二種方法，他稱之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非如此而不能「理解」經濟學。

也是在這一節，馬克思批評了黑格爾的思辨方法。或許，他也感受到元化先生在囚室裡感受到的那種生命之不能被邏輯化的永恆衝動？或許他也如元化先生這樣對偉大文學作品保持著難以遏制的閱讀激情？總之，我從元化先生的讀書筆記，感受到了馬克思上述見解對我學術生命的重要意義。

在其仁這部文集第一部分的至少兩篇文章裡，我讀到其仁對馬克思全部價值理論的批評：「沒有人指出，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是交易費用為零。」這是十分中肯的批評，馬克思價值學說以及全部馬

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隱含的基本假設之一是交易費用為零。著名的「科斯定理」（其仁對這一定理的「交易費用為零」假設耿耿於懷），我反覆解釋過，廣義而言，等價於這一陳述：在沒有交易費用的世界裡，制度是無關緊要的。這是一項基本的社會科學命題，對那些想要理解其仁這部作品之深意的讀者來說，格外重要。

如果沒有交易費用，不論中國實行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都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議題。關鍵在於，科斯定理的反面，即交易費用不可忽視的世界，其仁和張五常所說的「真實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一個社會實行甚麼樣的制度，幾乎總是決定著這個社會的命運。

其仁不厭其煩地講述中國改革的故事，用意在於提醒讀者關注和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湧現的改革圖景。通過其仁的敘述，讀者很容易理解，符合改革邏輯的中國未來改革圖景，必須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我喜歡更直接的表述：妨礙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關鍵環節將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經濟的。

政治體制改革，其仁在這裡反覆介紹，是鄧小平的未竟之志。在當代中國，任何政黨，只要公開聲明自己的政治綱領是為百姓謀幸福，就必須選擇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限制權力。因為，任何尚未完全喪失常識感的中國人都懂得，普遍的腐敗源於不受限制的權力。阿克頓勳爵的名言耳熟能詳：權力趨於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趨於腐敗。

跋是可以很長的，我的跋，由於我讀其仁文章感受的豐富性，由於我通過其仁感受而由抽象上升到具體所得的豐富感受，可以更長。就此住筆，是為跋。